

## 评苏成捷《中华帝国晚期的性、法律与社会》

李 硕

(清华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084)

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苏成捷(Matthew H. Sommer)教授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有关性犯罪领域的问题。他的专著《中华帝国晚期的性、法律与社会》(*Sex, Law,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*,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0),侧重从法史和社会史的角度,研究中国古代性犯罪问题。该书自2000年出版以来,中国学界少有回应和评价,本文算是在这方面一个迟来的回声。

法制史领域的性犯罪问题研究,在中国尚属新领域,但在二战后的西方法学界已有多年积累。例如,属于“古典学”的古希腊史,在西方经过数百年耕垦后已少有新热点。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美国学者对一份古希腊文献《吕西阿斯篇》中《关于伊洛托斯芬尼斯被杀案》产生不同解读,引发了在古希腊社会到底“强奸还是通奸所受的刑罚更重”的争论。一时间,多位古典学者都撰文参与讨论,堪称古典学界一场盛事。在这种背景下,西方法史学界对中国古代性犯罪问题进行“拓殖”,就很自然。

该书在引言和结论之外,共有六章,分别是:对中国古代性规范的考察(第二章);中国古代有关强奸法律的发展(第三章);清代的同性恋法律与性别角色(第四章);清代寡妇的性与财产(第五章);娼妓的法律变迁问题(第六、七章)。

该著作的主要特点,就是从社会形态和观念变迁的角度,对性犯罪与法律问题进行

宏观考察。苏成捷比较从唐代到清代性犯罪法律的变化,从中总结出的宏观趋势是:阶级身份区别的弱化,性别角色、道德的强化。由此,他提出了清代立法者强化保护道德和贞操的观点。比如在第二章中,关于男性主人与婢女的性关系问题,苏氏认为唐代以降的立法者们普遍承认主人对婢女的性特权,但到清代中叶(雍正和乾隆时期),立法者对于性行为的管制更趋严厉,主人对婢女的性特权也受到限制。这反映了阶级身份制的削弱,社会趋于平面化。

再如关于强奸问题的第三章,苏氏总结了对强奸犯量刑的加重趋势:唐代为一年半或二年徒刑,明清则是绞监候。伴随这一过程的是立法、执法者要求女性被害者表现出明显的反抗,才能将案件认定为“强”奸,这反映了立法者对妇女贞操重要性的关注提升。苏成捷还强调了法律对强奸当事双方身份关注的区别:唐代法律关注的“良贱”主要是双方阶级身份的区别,由此带来对罪犯量刑的区别,重点防范以下犯上的性犯罪;而对清代立法者,“良”人妇女则主要意味着未曾犯(通)奸的、贞洁的妇女。由此,他认为清代立法者用性别角色和道德的关注,代替了以往的身份关注。

同样,中国古代法律中长期没有对同性性行为(鸡奸)的规范。到清代,才正式对鸡奸者比照男女犯奸律文科罪。苏成捷认为这体现了对男性(主要是未成年幼童)贞操的

关注和保护。苏氏认为这也是清代阶级差别弱化、性别道德强化的法律体现。

阶级—道德的转换之外,苏氏著作的另一大特点,就是重视社会经济对性关系,尤其是性犯罪的影响。比如在第二、七章中,他讨论了清代丈夫纵容甚至强迫妻子卖淫或与他人同居的案件。在强奸与同性行为的章节内,他注意到当时赤贫的流氓“光棍”阶层,由于没有家室和情欲发泄渠道,而导致的性犯罪问题。寡妇的守贞和财产一章,他认为寡妇坚持守贞不嫁,很大程度上在于试图保有亡夫的财产;而夫家人通过“捉奸”将寡妇赶出家门,也有争夺财产的考虑。在娼妓立法部分,他引述了刑科题本、巴县档案中的一些案例,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社会底层的妓女与掮客、衙役的共生食物链关系。

对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赤贫人群,长期以来很难被经济史、社会史学者重视,因为正规文献史料中少有这些人的记载。但法制史的学者在这方面却往往独有新见。他们往往关注暴力犯罪人或犯罪受害人,刑事档案中多有他们的记载(D.布迪等著《中华帝国的法律》在这方面也有同样表现)。苏成捷此书中就多有对这些人的讨论。尤其重要的是,清代关于惩治“光棍”的法例越来越多,反映出在身份阶级制消亡之后,仍有一个庞大的、赤贫的、具有反主流社会性质的人群存在,并呈现发展壮大态势。当然,从性犯罪角度,仅能观察这个人群的一个侧面。以后如果对此问题进行全面的社会史研究,应当是非常有价值的。

除了上述贡献,该书在论证方式与文献运用上还存在一些局限。比如苏氏讨论的从唐到清代中叶身份关系的弱化,是一个非常宏观的概括。但在法律实际运行层面,单个朝代往往构成“微循环”:一个王朝建立之初,有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区别,从而产生出身份制的贵

贱区别。但随着时代变迁、商品经济侵蚀,到该王朝中后期,这种身份制渐渐受到冲击而趋于式微,并在法律上有所体现。唐代、宋代、明代等周期较长的王朝,法制运行层面都发生过这种问题。所以,划一条从唐到清的宏观脉络固然简单,但可能遗漏了诸多以王朝为周期的社会循环流动问题。但这个问题难以进行深入讨论,因为现存古代刑事档案以清代为主,之前则难以进行细致研究。

苏成捷遇到的另一个文献困难,则是清代的司法档案,尤其是刑科题本数量极多,其中仅涉及婚姻奸情类案件,就在十万宗以上。这导致任何一名研究者都不能穷尽。苏成捷采取的方式,类似于“探针式”的抽样法。该书引用的一档馆藏刑科题本主要有两部分,分别属于顺治年间和乾隆中前期,所覆盖年份很有限,中间时间跨度也很大。从理论上说,两个点中间划出一条直线是最便捷的做法。但这两个点之间是否真的是直线发展?这恐怕也是更受制于研究者先入之见的问题。另外,苏成捷对“抽样式”引用题本的范围、方法,并未作出专门说明,只是用举例法进行论证。如果参照社会学抽样的统计方法,可能更有说服力。

作为一位来自不同语言环境的研究者,苏氏在文献运用上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不足。这不当求全责备,但应予以指出。比如他运用的司法文书档案涵盖从唐到清,比较全面,但没有采用《皇明条法事类纂》,这一文献保存了明代中前期大量案例,对法制史和社会史研究非常有价值。再如,除了律文本本身,清代法典还有大量承袭明代之处,这就是《顺治律》正文之后的小注,它们主要是从明代中后期形成的“例”改编而来。注意到这一点,就能更细致地讨论明清法律的继承性问题,而苏氏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(当然,这个问题不仅局限于性犯罪法律,目前尚未见

有专门研究,甚为可惜)。

总之,苏成捷的《中华帝国晚期的性、法律和社会》一书,是法制史和社会史研究相

结合的成功范例。作者近年来研究轨迹的变迁与深入,也体现了从法制史出发,向社会史深处开拓的广阔学术前景。

## 《中国历史地理学·综述》评介

卢祥亮

(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北京 100872)

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萌芽于20世纪初,至20世纪30年代渐兴,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发展,成绩斐然。对以往研究进行全面回顾和总结,不仅可以为专业学者提供丰富的学术信息,而且对认清学科发展方向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,是一项有益学界的基础性工作。中国人民大学华林甫教授所著《中国历史地理学·综述》(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)是一部对中国历史地理学进行系统全面总结的著作,以20世纪百年间历史地理学的学科、学人、学术成果为基础,分为十四个专题,辅以学科大事记,全面系统的回顾了本学科的发展历程,是目前这一领域比较全面、系统、深入的著作。综观全书,有以下几个特点,试为读者析之。

一、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历史地理学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。历史地理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,学术成果不胜枚举,如何从中精心挑选出最具学术价值的论著,进行科学的评价与总结,可以体现作者的学术涵养。《中国历史地理学·综述》资料搜集范围较为全面,举凡通论著作、学术专著、期刊、文集、论著索引、地图集、辞典等,无不囊括,汰芜取精,力求全方位反映学科建设成就。该

书虽曰综述,但并非一味将既有研究加以罗列,而是进行归纳总结,有序排比,合理分类,提炼精华;介绍各项研究也是以凝练的文字进行高度概括,而且所列论著均为该领域最重要的成果,有所取舍,门类齐全,详略得宜。

该书共有14章,系统回顾了历史地理学的渊源、产生与发展,关于学科性质与理论的讨论,学科建设的成就、学人、学派与学界现状,历史自然地理、历史政治地理、历史经济地理、历史人口地理、历史聚落地理、历史交通与军事地理、历史社会文化地理、历史地理文献研究的研究概况,涉及了本学科史上绝大部分重要论著,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本学科发展的熟稔程度。

全书各章中,学科理论、历史自然地理、历史地理文献研究(含历史地图学)各占一章,而历史人文地理则占七章,其中历史政治地理又独占两章。章节的分布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现状:学科理论建设滞后,而且各分支领域发展不平衡;历史自然地理虽只占一章,但篇幅较大,历史自然地理利用现代高科技为辅助手段,取得了不少成绩,其未来发展不可限量;历史人文地理则是传统强项,成果最为丰富,尤其历史政治地